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程霖 陈旭东 张中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形成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拥有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闪光点,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亦丰富了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先行思想构成因素之一,如在日本经营管理模式建构、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及宏观经济稳定中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借鉴作用。尽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未能独立地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但是可以为解决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为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提供哲学基础。因此,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有助于探究民族复兴的经济内涵和实现途径。

关键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成就 贡献 历史地位

一、引言

近代以降,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逐步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与应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则,这种单向度的“复制”、“借鉴”、“国际接轨”的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也有其弊端,它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科和经济思想自主性的确立,我们亟待迈向一个全新的知识传播阶段,即面向世界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思想对话和经济学术交流的阶段。这种对话和交流要真正形成有意义的碰撞火花,固然要借助于国际通行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应当植根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土壤之中。其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①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亮点,诚如马寅初在给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序言中所写道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古先圣哲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欧美各国,未遑多让”。^②

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学者之中,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焕章是一位先行者,在其由哥大刊行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序言中,他曾自称是一名采矿者,努力从孔子思想这座“蕴藏着丰富矿藏的大山”中去“萃取独特的矿石,并以之贡献给世界生产”,以求“努力增添人类知识”。^③这样的学术旨

[作者简介] 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200433,邮箱:clin63@mail.shufe.edu.cn;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院博士生,上海,200433,邮箱:chen.xudong@mail.shufe.edu.cn;张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邮箱:zhangshen@sass.org.cn。

* 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项目“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与思想”(20141103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向北京大学第三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2013)、山东财经大学泰山论坛“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学专题暨2013中国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① 按照赵靖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经济思想。它是在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或者基本上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情况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 马寅初:《马序》,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Ⅵ页。

③ 参见陈焕章著,韩华译《孔门理财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趣和理想,也得到了后世许多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认同。正是为了打破经济学说史中“言必称希腊”的观念传统,以及回应“欧洲中心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贬低歧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胡寄窗通过披荆斩棘、沙里淘金的学术努力,对散落在中国浩瀚历史典籍中的大量珍贵思想资料加以整理,于1984年和2009年也先后出版了两本英文著作,^①向海外介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陆续又有一些与外国学者合作的英文著述在国外知名经济、金融刊物发表,如郑学益、张亚光和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基于西方货币理论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和货币政策,并与欧洲和北美晚期的货币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② 在国外著作出版方面,则有英国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2014年出版发行的由程霖、泰瑞·彼驰(Terry Peach)和王昉主编的英文论文集《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特征,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 and 影响。^③ 此类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不断开掘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和论证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曾经领先于世界,而且对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成为其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谈敏在其专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中,即从经济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及西方近代经济学说的影响,科学论证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整体而言,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专著和论文。^④ 与此同时,与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崛起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使得对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意义也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⑤ 其中,一些学者开始大胆尝试构建对解释和解决重大经济现实问题有用,同时具有中国传统经济思

① 分别是 Hu Jichuang,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Hu Jichuang,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9.

② Zheng Xueyi, Zhang Yaguang and John Whalley, “Monetary Theory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ought”,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March 2011, pp. 49 - 53; Zheng Xueyi, Zhang Yaguang and John Whalley,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from a Chin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6 (September 2013), pp. 89 - 104.

③ Cheng Lin, Terry Peach and Wang Fang, eds.,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此外,2013年劳特利奇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部会议论文集《中西经济发展思想》(*Though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and the West*),该书由德国奥尔登堡大学(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ät Oldenburg)特劳特温(Hans-Michael Trautwein)教授和武汉大学马颖教授共同主编,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思想,内有对严复、何廉等近世中国学人的经济思想介绍。

④ 如,李肇义:《中国公元前3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的影响》(法文),1938年,转引自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胡寄窗:《从世界范围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盛洪:《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读书》1994年第12期;L. Young, “The Tao of Markets: 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2 (September 1996), pp. 137 - 145;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

⑤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意义的既有研究,包括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叶坦《中国传统的经济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研究》专刊(台北)第22卷,2000年4月;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马涛《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学习论坛》2005年第1期;韦苇《中国经济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与此同时,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好奇度也逐渐提升,希望探寻传统的中华文明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崛起有什么样的影响,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根源和未来走向。

想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体系,即试图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①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为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提供哲学基础,^②从而基于对其成就、贡献和影响的维度来全面考察和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有助于探究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内涵和实现途径。

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纵向和横向考察

如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贡献与历史地位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认知和判断,需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综合考察,单一、偏颇的视角带来的后果要么是盲目自大,要么是自惭形秽。无疑,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及其引致的中西大分流之后,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成熟于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的西方,进而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又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大国,她是否曾经有过足资珍视的、具有光辉成就的经济思想?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确曾产生过丰富的古典经济思想,即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③

不过,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足值珍视的经济思想,国内外学术界曾经存在过较大的歧见。近代以来,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部分是持否定意见的,一些学者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全盘否定。美国学者奥弗顿·泰勒1956年在关于“东方经济思想及其应用和方法”的学术讨论中就称,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和智识传统中没有“足以与中世纪西方经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东西。”^④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在古代最有可能产生经济分析的国家就是中国,“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⑤当然,熊彼特在议论中国时也显露出了某种迟疑,认为中国古代至少在货币管理方面应有一定的分析成分,只是也许还未发现。这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谙中文,无法直接阅读中文尤其是古汉语文献。这样,他们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有限知识,大部分只是来自于西方传教士或留学生介绍到西方的少数中国文化典籍,他们基于此得出的判断是有局限的。

当然,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给予了肯定。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施格在其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就指出,儒学“是一伟大的理财体系,伟大的道德与宗教体系。”^⑥陈焕章学贯中外、兼通古今,其专著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儒家经济思想,无疑为国际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一扇大门。凯恩斯在1912年为《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曾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

① 如黄少安认为,“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可能提炼出‘合作’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黄少安:《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的详细讨论,参见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文汇报》2016年2月26日),这里仅作概要介绍。

③ 参见石世奇《中国经济学说辉煌的过去与灿烂的未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石世奇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Overton H. Taylor,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Methodology in the East: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No. 2 (May 1956), pp. 413 - 416. 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石世奇等先生在其著述中均曾提及此人此文,并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对其武断结论予以有力反击。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巫宝三《中国古代经济分析论著述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1期;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册,第3页;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⑤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页。

⑥ [美]亨利·施格:《理财学教授施格先生序》,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中译本),第2页。

燮、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①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面向广受宣扬之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讲演中就曾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句话,正代表了他“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②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道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庄子重申并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是第一位发展出“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发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哈耶克要远为超前。^③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格则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水之趋下”,而斯密曾在创作《国富论》之前去法国访问,杨格据此推断斯密曾直接从杜尔阁及与之熟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并受到其思想的启发。^④

改革开放之后,胡寄窗、巫宝三等一批中西兼通、古今兼擅的学者,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奠基人,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以及对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阐发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成就。这些开创性研究,为后辈学人研究同类问题,提供了基准点或参考系。当然,历史是常读常新的,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解读,常会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和教益。对于经济史学,无论是经济思想史还是经济史的研究,应该在坚守学科基质的同时秉持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学术眼光。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面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和学术的发展新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究竟有何成就?又有哪些思想创见和独特之处?是否具有一定的经济分析成分?

回顾国内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成就的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围绕特定经济范畴、特定历史阶段的片段式经济思想进行辨析,而缺乏以一种基于大历史视角的、与经济社会变革相关联的阐述;二是比较注重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可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概念比附的经济思想和概念的梳理,而对于中国自身所独有的一些经济概念术语言之甚少;三是偏重于对规范性论述的解读和呈现,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分析性成分挖掘得不够。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和基本特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概括,以获得一个更全面、客观的认知。

其一,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渐次发展,使得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经济思想亦不断累积、丰富,外延广阔。经济思想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现象投射在人类意识中,继而经过思维过程形成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和规范主张。它既来源于实践,也会反作用于实践。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转型期社会经济变革与思想文化激荡往往是相生相伴的,每当此际,传统的价值观念、学术体系和政策安排就会受到新的经济思想或思潮的激烈冲撞,围绕各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不同流派也会产生不尽相同的政策见解、意见、主张,继而将对当时的经济制度创设和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回溯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至少有三大重要转型时期值得称述。

先秦时期。尤其是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处于空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铁器及牛耕开始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得到使用和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农用动力的革命和粮食产量的提高,催生出较以往更为丰富的经济活动,而诸侯纷争与列强兼并也使得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

① J. M. Keynes, “Review: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by Chen Huan-Chang”, *Economic Journal*, Vol. 22, No. 88 (December 1912), pp. 584 – 588.

② 参见冯兴元《从老子的“无为而治”到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东方早报》2014年9月14日,第B14版。

③ Rothbard, Murray,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5, pp. 24 – 25.

④ Leslie Young, “The Tao of Markets: 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2, 1996, pp. 137 – 145.

转型的双重背景,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诸家的多元思想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各学派学者勇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见解,也敢于对不同于己的观点进行批评或争论,这造就了各类经济思想的勃兴。在这其中,以富强为指向的治理思想作为立国建业的指导思想在列国争霸时期备受重视,齐法家的富国富民论、秦晋法家的弱民富国论和儒家的裕民富国论在辩争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采纳。然而与当时西方思想家一样,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此时中国的思想家在论述具体经济问题时,往往也是将其与相关的伦理、政治、哲学等问题混为一谈,如《论语》、《老子》、《孟子》、《墨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先哲的论著,均为涵括政治、人文、道德、法律在内的百科全书式典籍,关于义利、本末、奢俭、富国富民等不同议题的经济观点掺杂其间。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①也奠定了此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整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滥觞期,后世各家各派经济思想大都可以在哲学上从此找到源头。

西汉时期。在先后遭受了秦末战争及楚汉战争的破坏之后,西汉初期面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社会局面。为此,汉高祖刘邦在基本沿袭了秦所开创的政治经济体制基础之上,围绕“休养生息”及“精兵简政”两大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历了汉初的休养生息与“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对内统治、支持对外战争,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和学术上表现为独尊儒术,随之经济思想也从自由驰骋的思想争鸣转为更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则表现为统制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盐、铁、酒等产品收归为官营专卖,推行算缗、告缗,对豪商大贾征以重税以抑商扶农,采行均输、平准等政策使商人失去投机机会以保护农民利益并丰实财政。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儒生的激烈辩论,是对这个变革时期经济思想中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之争的全息展示,也是世界上较早对国家政权与市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讨论的文献。后世各朝代大体也走出了与汉朝类似的轨迹,初期放任,休养生息,而后干涉,巧取豪夺,如此往复。虽然该时期没有突破以往经济思想而产生更多的原创性思潮、思想,但其对于先秦诸子经济构想的实践性运用也颇具贡献,在重本抑末、^②重义轻利、黜奢崇俭、经济干预与自由放任、财政、货币和田制等方面均为后世确立了正统思想和制度性遗产。因此,该时期可谓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主流面向的形成期。

宋代时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③11世纪的宋朝更被李约瑟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④宋代的江南地区,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汉唐社会相比,发生了重要转变,商品经济的成分急速成长,被认为已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⑤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亦认为,此时期的中国“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伴的是,货币和财政问题成为此时段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的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尤其是纸币的产生催生了以纸币发行流通管理原则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称提之术”。科技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业与都市文明的勃兴还孕育了崇尚“事功”、主张义利合一的浙江永嘉学派,它继承了传统儒学“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与一些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教条进行了学术论争,如叶适的“义利相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② 在《盐铁论》中,重本抑末连同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等一道被封作圣王之道,自此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赵靖先生认为,《盐铁论》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第673—681页。

③ 参见[日]内藤湖南著,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 [英]李约瑟著,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⑤ 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和”、“扶持商贾”、“理财非聚敛”等思想,其经世致用之学并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远播世界。所以,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型期,一系列非主流、非官方的学术观点得以传播和伸张,并形成学派。尽管它们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正统思想的教条,却使得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面向更加多维,内涵更加丰富。

至明清时期,中国已累积了蔚然可观的经济思想,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异常丰富,涵盖国家财政税收、货币管理、人口问题、土地制度等传统社会的核心议题,以及治理思想、商业经济贸易思想、价格与价值思想、社会分工思想、劳动生产思想、分配思想、流通思想、消费思想等。^① 期间,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传教与清朝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是西方学术输入我国的两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后者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类专题研究的不断开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些新的重要面向也正逐步进入学界同行的学术视野,如生态经济思想、^②粮食储备思想、经济诚信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军事经济思想等,这些专题领域大多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相关。通过回溯中国古代相关领域的思想源流与实践,对解决当前现实社会经济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③

其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中文和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为载体,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传统经济特色的概念术语。这里的概念术语主要是指对与经济相关的事物和范畴的专有抽象表达,以及对某一具体经济主张的概括性表述,它们并不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一一对应,但却以中文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所处经济社会背景为基础,较为广泛地为当时及后世的官僚、学者继承沿用,并因一些概念术语之间存在含义及逻辑的连贯性、相关性,所以很大程度上构筑了古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话语体系”。除了代表经济的“食货”“货殖”“理财”等,以及“义”与“利”、“本”与“末”、“奢”与“俭”等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外,我们进一步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所体现的主要概念术语按照分类分别梳理如下:

表 1 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概念术语的初步归纳

主要分类	概念术语
财政思想	量入为出、寓禁于征、任土所宜、轻重重远、相地而衰征、敛从其薄、使民以时、常征、助而不税、讥而不征、官山海、征籍、不籍贍国、开源节流、榷、均输、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租庸调、量出以制入、两税法、计资而税、丁夫为本、募役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出纳移用、纠察钩考、一条鞭法等
土地思想	井田、正经界、辕田、限田、王田、官田、屯田、占田、均田、垦田、民田、营田、置田、配丁田法、均田免粮、惟农有田、专地、耕而勿有、兼并、租佃等
治理思想	安富(保富)、足民、足食、与民争利、富民、国富而贫治、富国、养民、富而后教、民惟邦本、藏富于民、利用厚生、安民足用、仁政、无为、垂拱而治、休养生息、善者因之、因俗而治、国轨、开闢、五均、六筦、法术势、康功田功、并耕而食、大同、小康、小国寡民、隐穴、农宗、恒产、农战、耕战、移民实边、屯垦、常平仓、义舍、荒政、分民定业、劝分、经世致用、禁遏余、以工代赈、移民就谷、兴利除弊等

① 当代国内对这些领域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已积累了可观的著作文献。详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6 年版;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4 年版;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等。

② 詹金斯(T. N. Jenkins)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需要置入一个长久以来缺乏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道德维度,而这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生态思想概念资源支持。参见 T. N. Jenkins,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Lessons for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Worldview",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40, No. 1 (January 2002), pp. 39 - 52.

③ 国内在这些领域的相关著作,详见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黄海涛《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李建军《中国古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赵麦茹《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学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刘甲朋《中国古代粮食储备调节制度思想演进》,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等。

续表 1

主要分类	概念术语
货币思想	子母相权、环乘之币、法钱、禁铜七福、统一、钱神、铸大钱、流借、虚实、漏卮等
商业贸易思想	待乏、计然之术、积著、诚一、用奇、乐观时变、先期输直等
价格与价值思想	轻重、市不豫价、谷贱伤农、平糶齐物、农末俱利、平糶、衡无数、以重射轻、以贱泄贵、市价不貳、平准、市平、市易法等
分配思想	均贫富、贫富两便、制理明分等
分工思想	四民分业、通功易事、谋道、谋食、仕则不商等
消费思想	黜奢崇俭、强本节用、侈靡等
劳动生产流通思想	强力疾作、尽地力之教、敛散、无夺农时、日力等
人口思想	民数、料民、土满、地满、人满、天地调剂、君相调剂等
其他思想	六岁穰六岁旱、货殖、食货、赊贷、贵己、知足、去欲、见素抱朴、无欲、节欲、道欲、自为、天理人欲等

资料来源：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1—4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由表 1 可见，治理思想领域产生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这应与中国士大夫谈论经济问题往往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和情怀有关。此系列概念术语涉及诸多内容，有的与国富、民富相关，一方面有提倡“富民”、“足民”及与此相关的如“富而后教”、“民惟邦本”、“藏富于民”、“利用厚生”^①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主张如“国富而治，王之道也”，^②“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③的“国富”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富而贫治”^④的观点。有的与理想社会的构建有关，如儒家的“大同”、“小康”，道家的“小国寡民”，农家的“并耕而食”，以及清龚自珍的“农宗”。有的与国家之于经济的管理有关，有主张放任自由的思想如“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善者因之”、“不与民争利”等，也有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想如“国轨”、“开闢”^⑤等。另外，保证粮食的供给与价格平稳，以及对灾荒进行救助，亦是封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治理内容，于是由此产生了与“荒政”有关的经济主张，如建立“常平仓”、“义舍”等。

财政思想领域同样孕育了诸多经济概念术语，正如有论者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精粹的绝大部分都应归类于财政思想”。^⑥有的概念术语是与赋税相关，包括了主张低税负的观点，如“敛从其薄”、^⑦“常征”、^⑧“助而不税”、“讥而不征”^⑨等；主张差异化征税的观点，如“任土所宜”、^⑩“相地而衰征”、^⑪“轻近重远”^⑫等；关于计税方法的观点，如“计资而税”、^⑬“丁夫为本”^⑭等。有的概念术

① 主张尽物之用以富裕民生的经济思想。《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② 《商君书·农战之三》。

③ 《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④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⑤ 《管子·山国轨》：“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乘马数》：“故开闢皆在上，无求于民。”

⑥ 参见陶一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0 页。

⑦ 《左传·哀公十一年》。

⑧ 《墨子·辞过》。

⑨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⑩ 《周礼·地官司徒》指出，“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而被后人总结为“任土所宜”。

⑪ 《国语·齐语》。

⑫ 《周礼·地官司徒》中的税率规定体现了离王城近税率低，离王城远税率高的思想，而被后人总结为“轻近重远”。

⑬ 杨炎明确指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参见《旧唐书》卷 118《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421 页。

⑭ [唐]陆贽著，刘泽民校点：《陆宣公集》卷 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4—245 页。

语是与财政收支管理相关,如西周时期即已形成的“量入以为出”,^①唐代杨炎提出的“量出以制入”,^②以及“节其流,开其源”^③等均为后世所推崇的重要财政概念。魏晋傅玄提出的“至平”“积俭”“有常”“壹制”租税四原则,如孤立地看也许每一条都鲜有创见,但将其结合起来看却是一套很超前的租税原则,触及了现代财税理论的一些核心元素。另外,有的概念术语还与中国特定经济与政治背景下的财政制度安排有关,如西汉桑弘羊提出的“均输”“专卖”以及北宋王安石提出的“募役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

土地思想方面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概念术语,且其彼此之间存在相对明显的范畴与逻辑的关联,即中国古代土地思想的概念术语大多以抑制土地兼并和配给平民土地为主要内容,旨在优化土地使用与分配这一农业经济中的核心生产要素配置。如孟子构划的自上古时期推行的井田制度,成为后世诸多思想家推崇的完美土地分配方案。而在井田不再可行的情况下,董仲舒提出了限制私有土地数量的限田制,^④王莽则提出了要求土地国有、禁止私人买卖、限制家庭土地数量的王田制。^⑤事实上,王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土地分配方案,但仅推行三年即告取消。西晋占田制大致也是如此,存在时间极短,而均田制则从北魏至隋唐实行了三百余年。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土地分配构想,如颜李学派的王源将土地制度形式分为民田和置田二种,民田是由既有田制逐步过渡到全面实行以国有为特征的置田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另外,他还主张“惟农为有田”,^⑥即主张只有农民才能具有买卖及使用土地的资格,类似于近现代概念中“耕者有其田”的思想。^⑦可见,以上土地经济概念术语虽有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但却有类似的作用目的,使得这些术语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关联。

货币思想方面,早在春秋时期,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即提出了“子母相权”、“轻重”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该适应于现实中的商品价格水平。汉朝贾谊主张垄断币材,认为如此将获得七重益处,因此其思想被称之为“禁铜七福”。^⑧“虚实”概念最早源于《盐铁论》,它经历了限于说明货币和商品间的关系到反映足值钱币和非足值钱币间、纸币和金属货币间的关系的演变。宋代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领域还产生了前文提到的“称提”之术。另外,北宋沈括指出,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可补货币流通量的不足,并将此思想概括为“流借”。^⑨这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的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数量关系的论述。

除以上几类主要经济思想内容中的概念术语外,还有一些关于商业经营的术语如“待乏”“诚一”“乐观时变”等,调节粮食价格的“平糶”“平糴”等,论述分工益处的“通功易事”等,论述土地与人口相对比例的“土满”“人满”等,在此不多做赘述。

① 《礼记·王制》。

②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第3421页。

③ 《荀子·富国篇》。

④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参见《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4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2页。

⑤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赢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参见《汉书》第99中《王莽传》第69中,第162页。

⑥ 参见[清]李埏《平书订》卷7《制田》第5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陈山榜等点校:《李埏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1页。

⑦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545页。

⑧ 此七个益处为:“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羨,则官富实而未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4下,第166页。

⑨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输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29页。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农业经济为主、商业经济为辅、大一统统治与小农经营相结合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以宝贵的总结、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智慧与经济活力,它是中国古代学者赖以表达思想与观点的语言工具,更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传承的载体。辨明这些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经济概念术语,是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了解古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有助于整理中国古代丰富经济思想遗产的关键途径。当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概念术语也存在一定局限。古汉语讲求精简与会意,因此从另一角度致使概念术语本身缺乏明确的界定,其使用的范畴大多为“本末”“轻重”“虚实”“国民”这样的相对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使得论证不够精密严谨;而至于像“称提”这样较为抽象、且需要清晰说明其含义的术语,就更为讨论与流传过程中造成了概念不清。^①

其三,尽管中国未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但涌现了许多曾经领先世界的、具有普世性的经济思想创见。按照赵靖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是围绕土地制度、地租及赋役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的。其中,租赋征课的轻重及其合理程度的把握,又是租赋问题的核心,也是自先秦以降我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给予较多关注的焦点。前已提及的“相地而衰征”,即是管仲在相齐桓公时提出的一条征课租赋的原则,其要义在于视土地的肥瘠程度和产出高下,区分不同的征课等级。这已经道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级差地租的本质内涵,如马克思所言,级差地租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② 其实,与租赋相关的诸如轻徭薄赋、负担平均、量入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糶准平、专税专用等闪烁着现代社会经济智慧光芒的思想大都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很多也被后世各朝代主持制定赋税政策者奉为圭臬。

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工商经济的几度繁荣和持续发展,也使得有关商品、货币、价格等方面的思想不绝如缕,并涌现了很多先行于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要素。例如,在商品经济和价格思想方面,范蠡作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首位商人传主,其以计然为师。后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性,他根据当时积累起来的天文、气候和农学知识,以五行之说与长期的农业丰歉经验相结合,揭示了农业收成是有周期起伏的,丰收灾年交替出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每逢6年一个中收期,12年一个大收期,反之欠收期亦然。据此,计然以短期波动、长期循环的眼光来掌握未来不同年份的农业产量增减趋势,指出了“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供求变化与价格涨落规律。^③ 范蠡则以“待乏”“积著”为准则运筹商业经济活动,进而富冠天下。西方最早试图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归因于农业丰歉的理论,则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于1875年提出的太阳黑子说经济周期理论,比范蠡的经济循环论整整晚了2000多年。杰文斯通过对英国此前200年来经济波动情况的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周期几乎是一致的,都在11年左右。

又如,货币制度与思想方面,《管子》早就提出了内含货币数量说思想的轻重理论,分析了货币、谷物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间的动态均衡关系,也被用于调节社会贫富。西汉贾谊也提出通过调节货币流通数量来调节物价的主张,“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④ 宋朝则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体系,当时学者如沈括对货币流通速度、^⑤周行己和李纲对货币发行准备金、^⑥叶适和袁燮对

① 南宋时期提及“称提之术”人虽多,但无人给其做出全面且精准的定义,因此后世有学者称,“研究南宋楮币,最困难之名词,即为‘称提’。”参见朱偁《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香港: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第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3页。

③ 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540页。

④ 《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4下,第166页。

⑤ 详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⑥ 详见叶坦《宋代纸币理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劣币驱逐良币”^①等均已有深刻见解,这些发现都要早于欧洲。到了15世纪,丘浚曾如此描述货币的作用,“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②显然,他对货币的价值贮藏、交换媒介、流通手段、价值尺度等职能均已有一定的认识。并且,丘浚还根据明代黄金较为缺乏、白银相对丰裕的现实,建议以银作为“上币”,借以节制钱币和宝钞(纸币)的投放量。“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③这实际已是具有“银本位”内涵的货币制度设计,初步涉及到货币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而欧洲此类观点的首次出现要到19世纪初,“金本位”制度也是直至1816年才首先在英国实行的。

事实表明,在西方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时期,中国在经济思想方面有着许多领先于前者的创见卓识。这些零散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文体的经济观点,如能进一步加以系统整理,将是对包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内的世界经济思想长期流变过程的还原式勾画,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绵延的软实力。

其四,与西方一样,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著作也是以规范性论述居多,分析性论述偏少,但亦有值得称述的近似经济分析的成份。何为“经济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的经济学家往往有不同的认知。如熊彼特认为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方面的内容,在其1949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所作的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就职演说中,他曾指出,“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④。对于不同分析工具的综合运用,也正构成了熊彼特自己的颇具特色的分析方法。而到了加里·贝克尔那里,“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⑤则构成了其经济分析的核心,他并运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他们都认为,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是应该且也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如以熊彼特的经济分析三要素来考察,中国古代显然没有非常成熟的统计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但中国历史一门的学术发展却是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不同学派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体系。其中,太史公司马迁秉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原则所作的历史记载和历史分析,终成就其《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在《史记》中,篇篇可见的“太史公曰”即为司马迁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个人解释,而与经济相关的历史解释和分析则集中体现于《货殖列传》一篇。此篇里,司马迁对虞夏以来的人性变化做了深刻论述,“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孰能之荣使。”其极与穷二字,无疑与贝克尔最大化行为假定的思想是相通的。而司马迁以“水之趋下”比喻“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则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构成了等价隐喻,他进而将市场通过价格自发调节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状态的机制归结为一种“自然之验”,与亚当·斯密、哈耶克等的自然秩序观形成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辉映。^⑥

其实,再往前回溯至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儒、墨、道、法、农、兵等诸家学派都曾较为完整地提出

① 详见叶坦《论宋代“钱荒”》,《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6卷,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③ 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7卷,第259页。

④ Schumpeter, Joseph A,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Daniel M. Hausman, e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0 - 275.

⑤ [美]加里·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⑥ L. Young, “The Tao of Markets: 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2 (September 1996), pp. 137 - 145.

各自对经济问题的见解。^①在这个时期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中,《管子》^②是比较重视用数量、重量、尺度统计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部典籍,其中就有一些论证性的经济分析。比如,《管子》主张盐铁专卖,寓税于价。以铁为例,“今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把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③又如,《管子》特别强调在开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时也要善于运用价格调节政策,千方百计地去争夺重要物资特别是粮食,以增强本国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同时达到削弱别国的效果。具体办法就是“谨守重流”,即严格执行高价流通的政策,将本国重要物资保持在一个高价位,“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④这样就可以形成“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的状况。^⑤

秦汉以后,中国经济思想随着社会经济变迁继续有所发展,并在一些超前于别国的经济实践领域形成了当时可称独特的内容。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货币实践较为超前和丰富,货币经济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与现代货币理论最为接近的,其中不乏前已提及的对于货币流通速度方面的经济分析所做出的良好开端。11世纪宋代的沈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⑥他在对钱荒的原因及其对策的分析中,即已认识到了加速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周转次数),可以缓解在实际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翁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⑦当然,沈括并没有基于当时的商品经济进一步统计实际铸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换量来核算货币流通速度,但即使如此这无疑仍堪称是十分精辟的科学见解。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研究此问题则已是600余年之后的事情了。

与沈括相比,晚于其约四个世纪的丘浚则是一位更加专注于经济议题且更为重视数量管理的思想家。为了稳定谷物价格,他建议“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⑧进而“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使人”。^⑨这不啻是建立一个官方的全国性谷物价格情报网,推而广之即是物价统计网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丘浚还首次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经济分析,得出陆路、河运、海运运粮三途中海运费用最省的结论,打破了海运险远、损人费财的定见。他对《元史》记载的至元二十年(1283)至天历二年(1329)长达47年的粮食海运数据进行了分析、加工,将起运数与到达数相减称之“所失者”,将所失者与起运数的比率谓之“每石欠”,也就是损失比率,这成为支撑他结论的重要依据。^⑩这里面实则已部分包含了熊彼特所称道的“科学”的经济分析的三要素——经济理论、统计和历史的有机结合,^⑪当然理论的成份还相对不足,但在那样一个年代已属难能可贵。

① 如谈敏、赵晓雷所指,秦汉以前中国学者“在财富、分工、交换、价格、价值、货币、赋税等范畴以及某些经济原理方面的分析,较之古希腊学者并无逊色,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参见谈敏、赵晓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前四卷古代部分评介》,《财经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当然,对于《管子》的成书年代,古今学术界都是有争议的。持成书于春秋时期、春秋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战国秦汉年间的都大有人在。笔者同意巫宝三的观点,《管子》主要是由战国时期稷下学者所撰写。参见巫宝三《〈管子〉研究小史》,《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

③ 《管子·海王》。

④ 《管子·山至数》。

⑤ 《管子·轻重乙》。

⑥ [英]李约瑟著,韩北忠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929页。

⑧ 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6卷,第251页。

⑨ 邱浚:《大学衍义补》第25卷,第243页。

⑩ 参见邱浚《大学衍义补》第34卷,第306—316页。

⑪ Joseph A Schumpeter,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Daniel M. Hausman, e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0 - 275.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内涵、外延、创见和分析层面均有可称述之处。为何能有此成就?如将思想也作为一个市场来看待,那么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竞争相对充分的思想市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很多基本要义由此生发,后世在大一统的古代政治社会体系下,亦曾有过多次社会经济大转型和思想市场上的活跃。成就与地位常常是相生相伴的,而历史地位的获得则源自绵延不绝的影响和贡献。这里,笔者分别从中国古代经济的持续繁荣、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形成、日本经营管理模式创新和美国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实践等视角,来说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 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思想动力^①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古代中国逐步建立起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科技和商品经济活动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经济成就,一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科技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②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常常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显然,如胡寄窗所言,“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经济思想或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这种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发展”,那么“将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经济之谜”。^③然而,要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社会经济实践的作用机理,还需借助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来对传统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和理论分析。这不仅对于加深国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其现实作用力的理解助益颇大,而且有助于用国际通行的规范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内核元素。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也离不开制度上的适应性变迁,这从史不绝书的大小历代的政治经济变革、变法可以得到佐证,而这些变革、变法所依据的则是一些具体的社会经济改革主张和改革方案。改革,必然涉及到对传统思想与实践的挑战。如此,关于改革主张和改革方案的论证、说明,及其与反改革势力的论战、争论,即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盐铁论》所记载的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论争为例,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商业思想在管理国家经济和丰实政府财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主张以国有专营来抑制兼并、调和贫富,从此也确立了官营工商业政策在古代中国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后世王莽改制、刘晏变法、王安石变法等与此改革逻辑均有暗合之处。

为古代政府调控经济活动提供思想指导,此为传统经济思想发挥动力作用之一端,另一端则是通过与文化、习俗、社会规范的交融来对微观和中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导引。如,孝道这一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独特元素,其对于家庭、宗族和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孝道在信贷市场极不完备的古代可视为一种独特的代际契约履约机制,它作为一种均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满足统治者和家庭的激励相容约束”,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④又如,

①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传统经济思想对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其负面影响。如在“重农抑商”的教条之下,国家对民间商人采取了经济压制和政治困辱的双重打压:一方面寓禁于征,实行“人头税”、“贾人倍算”等,另一方面也有“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商居四民之末等来贬低商人社会地位。“重农抑商”的国家主义本质维护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却对中国向以追求个体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形成了阻碍。

②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第2—3页。

④ 详见李金波、聂辉华《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丰富、多样的商帮治理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商品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基于激励理论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可以发现明清晋商、徽商的不同商帮治理模式和思想与地域文化、商人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互动关系。^① 中国古代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与不同地域文化相恰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多样性。

(二)为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渊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都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被马克思誉为“近代经济学的真正的始祖”^②,其学说的形成就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共同认知的经济学派,重农学派有着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并首次把研究从商品流通领域引入生产领域,其理论体系被马克思称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③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重农学派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更是影响到了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整个古典经济学,并经过后世一代代经济学家的吸收加工,渗透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④

其实,早在1909年,法国经济学者夏尔·季德和夏尔·李斯特在其合著的《经济学说史》中就首次提到法国重农学派曾受到过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认为“最能代表重农主义理想的君主也许是中国的皇帝”。^⑤ 日本学者泷本诚一则认为重农学派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四书五经。^⑥ 1931年,中国留学生李肇义在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亦考察了法国重农学派受到的中国影响,基于该论文的专著其后于1936年在巴黎出版。1936年,另一中国留学生闫宗临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第五部分专论“中国对18世纪法国的影响”,并指出“让魁奈对中国感兴趣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为他自己的经济理论找依据”。^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克里斯蒂安·格拉克(Christian Gerlach)则认为,是中国无为思想而非欧洲固有的利巴尼乌斯(Libanius)^⑧思想构成了重农学派的智识基础,直至19世纪中后期欧洲自由放任信条的发展才成为欧洲和亚洲经济思想的共同结晶,如果没有无为思想的引介,欧洲的前商业意识形态不可能发展成熟。^⑨

国内学术界关于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的论述较早可见于1936年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派为最显著”。^⑩ 然而对此课题的研究一度沉寂,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又被学人重新发掘。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巫宝三大致也是持与闫宗临相似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对魁奈的

① 详见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② [德]马克思著,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③ [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

④ Christian Gehrke and Heinz D. Kurz, “Karl Marx on Physi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2, No. 1 (Spring 1995), pp. 53-90; Ronald L. Meek, “Physiocracy and Classicism in Britain”, *Economic Journal*, Vol. 61, No. 241, (March 1951), pp. 26-47.

⑤ [法]夏尔·季德、夏尔·李斯特著,徐卓英、李炳焕、李履端译:《经济学说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页。

⑥ 当然,此观点疏于论证,曾被王亚南先生断然否认。转引自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⑦ 闫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⑧ 利巴尼乌斯(Libanius)为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异教徒哲学家、演说家、修辞学家,他曾颂扬过自由贸易的风俗与美德。

⑨ Christian Gerlach, “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 Working Paper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 (GEHN), 12/05/2005.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UK.

⑩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第440页。

学说思想“产生了某种推动力量”，“提供了有力的论证”。^①谈敏则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指出，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可以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找到“其整体的继承关系”，无论是魁奈的《经济表》，还是自然秩序思想、经济自由主义、重农主义、土地单一税思想等均留有中国的印记，受中国之影响相当广阔深入。因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当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思想起源之一，被载入经济思想的史册”。^②

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以中国古代学术讨论和政策思想较为发达的货币制度思想为例，其在世界范围内就得到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赞誉和引证。公共选择理论之父、寻租理论创始人戈登·图洛克 1957 年即曾撰文高度评价中国古代货币政策的成功，认为“中国的货币经历与现代货币理论或多或少有一致的地方”。^③如前所述，著有“货币三论”^④的凯恩斯对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和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所设计的第一个货币改革计划其实是“1910 年的中国‘金汇兑本位’计划”。^⑤当然，这一在凯恩斯去世后才被发现的货币改革计划及其对中国货币制度和思想的认知，是否对其后面一二十年里陆续出版的货币专著产生一定的启发和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挖掘。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受中国货币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则是有据可考的，他在晚年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中曾经多次提及中国的货币经济实践，并引用了一位荷兰学者在 19 世纪 70 年代对中国货币经济的观察和评论：中国流通纸币，“正是因为它不是法币，因为它跟国家没有关系，因而才被人们普遍地作为货币所接受”，^⑥将之作为其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支撑。

（三）为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思想来源

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最早可上溯至公元 285 年，^⑦其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本学者田岛锦治就曾以希腊、罗马学术对现代欧洲各国的影响作类比指出，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对日本上古以来至今的国民思想产生很大影响。^⑧明治维新时期，那些深受儒学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以儒学为媒介，认知、理解、诠释、传播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而日本现代企业的发展也开始自此进入了奠基期。这一时期，日本著名企业家也是日本“株式会社”企业组织创始人涩泽荣一曾提出著名的“论语加算盘”的日本经营模式，其基本精神就是“义利合一”。这一理念亦来自儒家的义利之辨，即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承认谋利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社会伦理。

二战后，日本企业家群体在坚守儒家传统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积极汲取西方管理模式的精髓，铸就了日本经济的奇迹。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除了吸收美国民主文化和科学管理之外，更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撑因素是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仁”“礼”“忠”“信”“义”“报恩”“和为贵”等经济伦理和民族精神。这些在被称作日本式经营三大支柱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中也都得到了集中体现。日本学者村山孚即称，日本在提升经济管理水平的过程中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科学管理，一个是中国的古典思想。”^⑨其实，不独是日本，其他

① 巫宝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② 谈敏：《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经济研究》1990 年第 6 期。

③ Gordon Tullock, “Paper Money-A Cycle in Catha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9, No. 3 (April 1957), pp. 393-407.

④ 即 1923 年《货币改革论》、1930 年《货币论》和 1936 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⑤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凯恩斯传》，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5—6 页。

⑥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姚中秋译：《货币的非国家化》，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9 页。

⑦ 李甦平：《儒学与日本》，《学术月刊》1986 年第 12 期。

⑧ 转引自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⑨ 参见村山孚口述，杨治翻译，孔庆广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和日本企业家——〈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本专家村山孚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上）》（1986 年 4 月 6 日），孔庆广新浪博客 2010 年 6 月 1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2a7f40100j14q.html,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东亚文化圈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大都也保持了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勤俭节约等积极因素,与儒家传统经济思想都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①

(四) 为美国当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借鉴

192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时任总统罗斯福认为解决农业萧条危机是解决一切危机的前提。在此背景下,时任农业部长华莱士1933年和1938年分别主持了两部农业调整法。这两部立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源自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②1944年,华莱士访华时曾指出,美国农业立法的思想渊源来自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王安石“在1068年的重大困难之下所遭遇的问题和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所遭遇的问题,虽然时代悬殊,几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也非常相似”。^③并且,他明确指出“常平仓”的名称是其从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一书中得来的。^④这里,华莱士所提及之方法主要是建立“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其中前者的主要职能是稳定农业收入,后者则旨在收购过剩农产品,救济城市贫民。这与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和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措施极其相似。

1937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其著作《储备与稳定: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一书的前言中亦开宗明义,“‘积谷防饥’本是中国的一句警世名言,现在突然成为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⑤格雷厄姆并对华莱士的常平仓计划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没有真正体现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的本质,主张将常平仓思想从农业领域扩展开来,赋予基本商品与原先赋予黄金相同的货币地位,以一揽子的基本商品储备建立现代常平仓制度,克服单一商品储备货币制度的缺陷,以稳定和改善美国的国民经济。其制度设计框架是:当基本商品供给过剩时,由国家收购和存储,使其退出流通,待需求增加时随时按需投放市场;收购和储存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应尽量包括较多重要商品,数量与一定时期内生产和消费量比例一致;每一单位储备商品的货币价值与每一美元的购买力固定于同一水平。^⑥其后,格雷厄姆又将此建议应用于国际领域,主张各国共同建立涵盖世界经济体系的常平仓,以稳定各国汇率,稳定市场价格,熨平经济周期。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哈耶克的认可和附议,认为其可用于原材料储备的金融稳定制度。^⑦

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藏着非常卓越而丰富的经济观念和制度元素,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在17世纪以前,在很多方面是大大超前于西方的,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其所依附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促成现代经济学理论生发与进步的思想渊源之一,为人类知识谱系的演化和延展做出了不应被忽视的重要贡献。其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西欧的早期形成及其后期发展有影响,还对二战以后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构建,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当代农业基本法的确立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 H. Kah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Croom Helm, 1979; 参见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

② 在这方面,李超民教授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即以《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为题,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思想对近代美国财政金融和经济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后于2002年出版。参见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美]华莱士:《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莱士副总统演词》,《新华日报》1944年6月23日,第2版。

④ 唯明编注:《华莱士在华言论集》(*Wallace in China*),重庆:世界出版社1944年版。

⑤ [美]本杰明·格雷厄姆著,储祥银译:《储备与稳定: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前言”,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 其实,格雷厄姆的这一货币改革提议也是受到爱迪生1922年出版的一份题为“一个对联邦储备制度的修正案建议”报告启发而提出的。参见本杰明·格雷厄姆《储备与稳定: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中译本)，“前言”，第4页。

⑦ Friedrich A. Hayek, “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Economic Journal*, Vol. 53, No. 210/211 (June-September 1943), pp. 176 - 184.

四、余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随着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中西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渐渐落后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而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也影响了学界对于其历史地位的确认。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特有的经济和管理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创建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中国经济学派的必然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中国经济学派应该也建基于一个可通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规范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上。这就需要推动传统范式的转换。否则,还会落入传统经济思想的旧的发展路径窠臼,难以有大的创新。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Cheng Lin Chen Xudong Zhang She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s rich and extensive in contents and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economic concep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rkling ideas worth cherishing.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ncient China's leading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for a long term,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world,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eanwhil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ha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primary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and exerted positive referenc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anagement mode and agricultural legislation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of Franklin Roosevelt's New Deal. Alth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didn't develop into modern economic theory, it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a today, and provides ideological guidance to establish Chines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Chinese management mode.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its historical rol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n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approach of realizing China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chievements; Contributions; Historical Role

(责任编辑:高超群)